



社科文献学术译库

国家的视角

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
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修订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科文献学术译库

国家的视角

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
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修订版)

〔美〕詹姆斯·C. 斯科特 (James C. Scott) 著
王晓毅译
胡搏校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 (美) 斯科特 (Scott, J. C.) 著；王晓毅译

· -- 修订本。--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4
(社科文献学术译库)

书名原文：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ISBN 978 - 7 - 5097 - 6969 - 0

I. ①国… II. ①斯… ②王… III. ①国家 - 总体规划 - 研究 IV. ①D0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0145 号

· 社科文献学术译库 ·

国家的视角 (修订版)

——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著 者 / [美] 詹姆斯·C. 斯科特 (James C. Scott)

译 者 / 王晓毅

校 者 / 胡 搏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刘 娟 刘学谦 肖世伟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当代世界出版社 (010) 59367004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7 字 数：444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6969 - 0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0 - 6443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科文献学术译库》出版者话

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同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吸收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密不可分的，其中国外优秀学术著作的引进、译介和出版成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发挥着前导、推动和促进的作用。对于欧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引进和译介可以追溯到 1839 年林则徐组织翻译的《四洲志》和 1842 年魏源汇编的《海国图志》。但较为系统地介绍和传播西方学术文化及其方法论和世界观，则肇始于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其代表人物是严复、梁启超、蔡元培和高君武等一批著名思想家。他们的学术活动和对于译著的积极倡导，取得了丰硕成果，为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做了舆论和理论准备。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把严复与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而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引进和译介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更不待言。毛泽东曾经称赞《反杜林论》的译者“功不在禹下”。早在延安时代，中共中央就做出了“关于翻译工作的决定”。回顾从清末民初到“五四”运动，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到 20 世纪 30 年代，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共和国初期到“文革”前夕，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从反对教条主义和极“左”思潮到今天的文化和学术的进一步繁荣的整个历程，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马克思主义精髓的伟力，同时也可以看到国人的思想解放、心智跃升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国际交流、吸纳、融合、批判、抵御和斗争形成一种密切的互动态势。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为己任，在创建之初就把编辑出版反映当代国外学术思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兴学科、边缘学科及跨学科研究等学术动态的译著，作为其重点之一，先后推出了《社会理论译丛》、《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政治理论译丛》、《当代西方学术前沿论丛》、《全球化译丛》、《阅读中国》等系列丛书，单书品种达 300 有余，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形成了自己的品牌特色。本着选择精品，推陈出新，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权威、前沿、原创的原则，以

20周年社庆为契机，我们在整合、提升和扩充既有资源，开拓创新的基础上，隆重推出《社科文献学术译库》，作为奉献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新礼物。

《社科文献学术译库》作为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力求展示三方面的主要特色。其一是时代意识。众所周知，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在科学认识的普遍进步和一浪高过一浪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学术界思潮迭起，此消彼长，哲学社会科学经历着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无论在理论和方法论方面，或者在研究的方式、工具和手段上，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社科文献学术译库》将突出当代的这种革命性变革，把译介比较系统、深入地梳理和论述这种变革的富有代表性的著述，当作首要的努力方向。

其二是问题意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内容的突破，引起理性认识和理论思维的基本方式的改变，促使科学认识中自觉的主体性原则日益突出，并导致整体认识论与个体认识论的融合，使人们有可能以具体化和量化的方式来描述世界的普遍联系，从而要求学科知识本身的不断革新，学科之间——不仅是哲学社会科学本身的各个学科之间，而且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之间——的开放和广泛合作，以及问题意识、跨学科意识和应用意识的不断加强。《社科文献学术译库》将以问题、思潮及其代表人物为主线，打破学科的单一界限和分类，整合成多个系列，突出理论和方法论研究本身的多重视角。

其三是开放意识。科学发展的意义本质上在于从不知到知的飞跃，逐步超越认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不断接近客观真理。开放性成为一切科学研究的显性特征，尤其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社会变革不断深化，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今天。《社科文献学术译库》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指导下的开放和兼容并蓄的编辑方针，促进不同学派之间及每个学派内部的不同观点的对话和讨论，激励新见解、新观点和新思想的涌现。同时，在学科的类型布局上，也不拘泥于传统的范围和分类，更加侧重向多学科和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及著述开放。

我们将始终坚持把“弘扬科学精神，服务理论创新，译介世界精品，借鉴先进文明”作为编辑《社科文献学术译库》的基本理念。殷切期望学术界同仁、专家学者以及广大读者给予支持，不吝赐教和指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6月

再一次永远地献给路易斯

欧文：怎么了？

约兰德：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很关心我在其中的角色，那可以说是一种驱逐。

欧文：我们正在编制六英寸的国家地图，那上面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约兰德：不是在……

欧文：我们将取消那些带来迷惑混淆的地名……

约兰德：谁迷惑了？人民迷惑了吗？

欧文：我们将那些地名标准化，使它们尽可能地准确和清楚。

约兰德：有些东西却被侵蚀了。

——布赖恩·福瑞尔 (Brian Friel), 《翻译 2.1》

中文版序言

能够为本书的中文版写作一个简短的序言是我的荣幸，同时它的出版也使我忐忑不安。

作为一个从事政治学和人类学研究近 40 年的学者，我感到长期和杰出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的知识传统使我受益匪浅。我从中吸收了大量知识，尽管只是通过翻译的著作。这不仅包括 20 世纪和 21 世纪的学术著作，而且包括中国的古典文学。我发现后者是极富启发意义的。比如，我最近发现，《水浒传》中充满了真知灼见，它表明在国家压迫下，人迹罕至的山地如何成为人们避难和复兴的场所。这一经验在很多方面也适用于我所研究的东南亚大陆山地与河谷之间的关系。

尽管我是从事东南亚问题研究，特别是从事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缅甸问题研究的专家，但我最初曾计划成为中国问题专家。在我开始研究生学习的 1962 年，访问中国是根本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从事研究了。那时，我非常想在村庄从事田野工作，而不想成为“扶手椅上”的图书馆学者。为此，我转而学习马来语，后来在马来西亚从事了两年的田野工作，《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New Haven, 1985）就是这一研究的成果。感谢威斯康星大学的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他不仅是我的同事和教学伙伴，也是我知识上的良师，他使我能够一直与中国农村的最新研究成果同行，这也包括他自己 [与毕克伟（Paul G. Pickowicz）和赛尔登（Mark Selden）] 关于河北省饶阳县五公村的著作（《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我也有幸培训了许多学生，他们现在出色地从事中国农村研究，并且与昆明可持续发展与地方知识研究所合作进行地方和俗语的识别。

读者将会清楚地看到，这本书的中心问题就是那些具有良好用意

的领袖是如何为使其人民和景观能够现代化而设计出种种项目的。这些项目是如此巨大，如此忽视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被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这已经成为我所关注的占主导地位的问题。我的结论是，“作为宗教信仰的极端现代主义”、独裁的权力以及软弱的市民社会为社会灾难和自然灾害的泛滥提供了条件。我从科学林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城市规划（巴西利亚）、坦桑尼亚的“村庄化”（乌贾玛）、苏联集体化和工业化农业中都得出了这一结论。在每一个案例中我都指出了所谓的规划者对其所要改变的社会或生态所知之少，而地方上流行的知识及其在压迫下的适应和逃避在许多时候是如何成功地避免了完全的灾难。我知道，我这里的一些结论也可以被推广到现代中国的一些时期（也就是“大跃进”时期和李森科主义的农业进步时期）。我将这些工作留给我的那些有才华的中国读者。

这些项目的基石来自我所称的“清晰和简单化的设计”，这些设计是所有社会规划、图解和管理所不可或缺的。作为一种控制人口流动的知识形式的户籍制度就是一例。按照欧洲的标准，中国人在这方面是早熟的，早在汉代中国就出现了正式的宗族姓氏制度。在它们之中，以及它们本身，清晰和简单化活动所显现的只是抽象的“能力”。它们可以被负责和有益地使用（比如对于追踪和控制非典型肺炎所必要的全国流行病统计数字），也可以为了无意义的目的而被不负责任地使用。尽管我所讨论的几个例子都是以前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规划，但是极端现代主义的狂妄及其带来的灾难（比如巴西利亚、科学林业、工业化农业）并非社会主义背景下独有的危险。它也同样可以是巨大并且强有力的组织在市场经济中的产物，当这些组织试图通过群体力量操纵自然和它们的人力以实现其控制范围最大化的时候，就会出现类似的结果。这部著作应被看作是对我所说的米提斯的赞颂：也就是对普通人所具有的关于他们周围社会和自然如何运作的实践和有用知识，以及他们抵制那些危害社会和自然的项目的能力的赞颂。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对“没有等级制度的社会秩序和相互密切关系”的赞颂，这是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倾向。后来在一般观念中，无政府主义代表了“无秩序和暴力”。秩序的建立不必压制地方的和流行的内容，压制地方和流行的东西往往会带来无序。

我将这部著作的出版看作一个开展与中国同事对话的机会，我期望从他们那里学习到的远比我所教授的更多。

詹姆斯·C. 斯科特

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Sterling）教授

农业研究项目主任

美国康涅狄格州纽黑文

导 言

这部著作产生于一次知识上的迂回旅行，它是如此吸引我，因而我决定完全放弃原来的旅程。当我做出这个似乎欠缺考虑的改变以后，沿途令人震惊的新风景和前途更为美好的信念说服我改变了我的全部计划。我想，新的旅程有自己的逻辑。如果在开始的时候我就有足够的智力想到这一点，这个旅行可能会更好。我清楚地看到，尽管这个旅程的道路比我所预见的更不平坦和曲折，但它会引我到更有价值的地方。当然，读者也许会找到一个更有经验的导游，但这是在人迹罕至的山路上的奇特旅行，一旦你走上了这条道路，你只能满足于你所能找到的那些当地的猎人做你的向导。

这里我想描述一下我的初衷。简单地说，最初我试图理解为什么国家看起来似乎总是“那些四处流动人群”的敌人。在东南亚，流动的刀耕火种的山民为一方，种植水稻的山谷王国为一方，上面的判断有助于理解这两方之间存在的由来已久的紧张关系。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区域地理问题。游牧民和放牧人（如柏柏尔人和贝都因人）、狩猎和采集者、吉普赛人、流浪汉、无家可归者、巡游的工匠、逃跑的奴隶、农奴，往往被国家看作是眼中钉。将这些流动的人口定居下来（定居化）往往成为长期的国家项目——之所以是长期的，部分原因也在于这些项目很少有成功的。

我越研究这些定居化的努力，越感觉到这是国家试图使社会更为清晰、重新安排人口从而使古典的国家职能（如税收、征兵和防止暴乱）更为简单容易所做的努力。从这些概念出发，我开始看到，清晰性是国家机器的中心问题。前现代化国家在许多关键方面几乎是盲人。它对它的统治对象所知甚少：他们的财富，他们所有的土地及产出，他们的居住地以及他们的身份。它缺少任何类似详细地图一样的东西来记载它的疆域和人口。在很大程度上，它也缺少能够将它所知道的东西进行“翻译”的统一标准和度量单位，而这是概括总结的基础。结果，国家对社会的干预往往

是粗劣的和自相矛盾的。

上面的观点是我迂回旅行的开始。国家对其统治对象及其环境的控制是如何逐渐加强的？固定姓氏的创建，度量衡的标准化，土地调查和人口登记制度的建立，自由租佃制度的出现，语言和法律条文的标准化，城市规划以及运输系统的组织等看来完全不同的一些过程，其目的都在于清晰化和简单化。在所有这些过程中，官员们都将极其复杂的、不清晰的和地方化的社会实践取消，如土地租佃习惯和命名习惯，而代之以他们制造出的标准格式，从而可以集中地从上到下加以记录和监测。

自然世界的组织也与此类似。事实上农业就是将植物群加以彻底的再组织和简单化，从而使之服务于人的目标。不管还有什么其他目的，科学林业和农业的设计、种植园的计划、集体农庄、乌贾玛（ujamaa）村庄、战略村落（strategic hamlets）等，所有这些的目的都在于使它的疆域、产品和它的劳动力更为清晰，因而更容易自上而下地加以控制。

在这里与养蜂做一个简单的类比会很有意义。在前现代化时代，采集蜂蜜是很困难的工作，甚至在蜜蜂都被关进稻草的蜂箱以后，采集蜂蜜仍然需要经常赶走蜜蜂，并经常损坏蜂群。每一个蜂箱的孵化格和储蜜格的布局都很复杂，不同蜂房之间各不相同，这使养蜂人无法将蜂蜜干净地抽取出来。而现代的蜂箱则不同，它的设计解决了采蜜人的问题。它使用一个“隔王板”的装置将下面的孵化格和上面的储蜜格分开，防止了蜂后将卵产在上面。此外，蜂巢也被设计成垂直的框架，每一个蜂箱里面有9~10个蜂框，这使收集蜂蜜、蜂蜡和蜂胶等工作变得很容易。现在只要看一下“蜂的空间”，也就是蜜蜂飞来飞去所留出的蜂框之间的距离，就可以采蜜了，而不需要再建造相互交连的蜂巢来连接各个蜂框。从养蜂人的观点看，现在的蜂箱更整洁、更“清晰”，使养蜂人更容易观察蜂群和蜂后，（根据重量）判断蜂蜜的产量，用标准单元扩大或缩小蜂箱，将之转移到新地方，更重要的是可以在温和气温下抽取足够的蜂蜜从而使蜂群能够安全过冬。

我并不打算将这个类比延伸到不适合的地方，但是欧洲早期的现代国家似乎都在努力将那些“社会象形文字”加以理性和标准化，从而使之成为更清晰、更便于管理的形式。社会简单化不仅导入了更精细的税收和兵役制度，而且极大地增强了国家的能力。这使国家可以有区别地介入各种各样的事务，如制定公共卫生标准、进行政治监督和救济贫困人口等。

我开始理解，现代国家机器的基本特征就是简单化，国家的简单化就像一张简略的地图。它们并未成功地表达它们所要描述的真实社会活动，它们的目的也不在此；它们只表达了官方观察员所感兴趣的片段。此外，它们还不仅仅是地图。如果说它们是地图，当它们与国家权力结合在一起时，就可以重新塑造它们所描述的事实。因此，国家制定地籍图册的目的是为了掌握那些要缴纳税收的财产所有者，它不仅仅记载了土地的租佃系统，而且创造了一个具有法律力量的分类系统。在第一章中我试图说明社会和环境如何被清晰化的国家地图改变。

这种观点并非仅限于对观察早期现代化国家有用。只要做一些适当的修改，就可以用来观察那些在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及东欧国家所发生的众多巨大的发展失败。

我考虑到，用失败来形容这些发展的灾难是远远不够的。苏联的集体化，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的强制村庄化都是 20 世纪人类巨大的悲剧，无论是生命的丧失或生活无可逆转地被打乱。如果不特指这些特别引人瞩目的事件，而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在第三世界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充满了大型农业项目和新城市（比如巴西利亚和昌迪加尔）失败的残骸，它们对当地居民产生了很大影响。种族之间、宗教派别之间和不同语言使用区之间的暴力冲突破坏了人们的生活。要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生活受到了这些暴力的影响并不难，但我们很难把握为什么那么多试图改善人类状态的项目只带来了悲剧式的结果。在这部著作中，我的目的在于解释这些 20 世纪乌托邦式的大型社会工程失败的背后所隐含的逻辑。

我将说明，那些国家发起的社会工程带来的巨大灾难产生于四个因素的致命结合。所有这四个因素结合在一起必然导致巨大灾难。第一个因素是对自然和社会的管理制度——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能够重塑社会的国家的简单化。就其自身而言，它们只是现代国家机器很普通的工具。它们对于保持我们的社会福利和自由，与制造潜在的暴君一样，是至关重要的。它们支撑了公民概念并提供了社会福利，同时它们也支持了驱赶那些不受欢迎的少数民族的政策。

第二个因素是我所称的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而固执的自信，他们对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生产能力的扩大、人们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以及对自然（包括人类社会）的掌握有很强烈的信心。他们特别相信，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的秩序。

毫无疑问，这种意识形态产生于西方，是前所未有的科学和工业进步的副产品。

一定不要将极端的现代主义与科学实践相混淆。正如“意识形态”一词所表明的，极端现代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信仰，其合法性来自于科学和技术的合法性。因此，它也是缺少批评和怀疑的，因而也是非科学地对人类居住和生产的综合计划可能性的盲目乐观。那些持极端现代主义的人倾向于以视觉美学的观点看待理性的秩序。在他们看来，一个有效率的、被理性组织起来的城市、村庄或农场是一个在几何学上显示出标准化和有秩序的城市、村庄或农场。如果一个极端现代主义者的计划失败或受到挫折，他们就会撤退到我所称的小型化中：在示范城市、示范村庄或示范农场中创造一个更容易控制的微观秩序。

4 极端现代主义既关注信念也关注“利益”。极端现代主义者，即便他们是资本主义企业家，也会要求政府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的计划。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国家有权力的官员或首脑。他们热衷于某些类型的计划和社会组织的形式（如大型水坝、中央通信和交通枢纽、大型工厂和农场、网格状的城市），因为这不仅恰好符合他们的极端现代主义观点，而且也回应了他们作为国家官员的政治利益。说句比较中性的话，极端现代主义与许多国家官员的利益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像任何意识形态一样，极端现代主义也有特定的世俗和社会含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国（特别是德国）动员国家经济时的出色表现使极端现代主义成为潮流。毫不奇怪，它肥沃的社会土壤来自计划者、工程师、建筑师、科学家或技师。作为新秩序的设计者，他们的技能和地位受到高度赞扬。极端现代主义者并不尊重传统的政治分野；无论在左派或右派中都可以发现他们，他们的共同点是特别希望使用国家的权力为我的工作习惯、生活方式、道德行为、世界观带来巨大的、乌托邦式的变化。这种乌托邦想象本身并没有危害。当它在一个自由的议会制社会中启动规划的时候，计划者要与组织起来的国民讨论协商，就很可能促进改革。

只有在第三个因素加入到前两个因素中以后，它们的结合才具有潜在的危害。第三个因素是一个独裁主义的国家，它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处于战争、革命、危机或民族解放中的社会往往为第三个因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紧急的状态往往导致对紧急权力的夺取，而这往往导致原有政

权被推翻。这样的社会往往会涌现出一批新的精英，这些新的精英拒绝所有过去的东西，要为他们的人们做出革命性的设计。

第四个因素与第三个因素紧密相关：软弱的公民社会，这样的社会缺少抵制这些计划的能力。战争、革命和经济崩溃都会使公民社会更为软弱，并使平民更愿意接受新的体制。由于它们具有实施社会工程的渴望和残暴对待平民反抗的力量，后殖民的统治偶尔也会符合最后一个条件。

总之，社会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规模开展社会工程的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愿望，独裁的国家则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等级社会作为其实现的基础。

读者可能已经注意到，我还没有解释这些被独裁主义权力支持的极端现代主义的计划为什么最终会失败。我写这本书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探讨他们为什么失败。

被设计或规划出来的社会秩序一定是简单的图解，它经常会忽略真实的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严格服从规则的工作（work-to-rule）的失败可以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它们表明，任何生产过程都依赖于许多非正式的和随机的活动，而这些活动不可能被正式设计在规划中。仅仅严格地服从制度而没有非正式和随机的活动，生产可能在事实上已经被迫停止。同样，那些规划城市、村庄或集体农庄所遵循的简单化规则也是不合适的，从中不能产生出有效的社会秩序。正式的项目实际上寄生于非正式的过程，没有这些非正式的过程，正式项目既不能产生，也不能存在。然而正式的项目往往不承认，甚至压抑非正式过程，这就不仅损坏了项目目标人群的利益，也最终导致了设计者的失败。

这本书可以看成是一个反对极端现代主义的、人工设计社会秩序的帝国主义的一个案例。我在这里强调“帝国主义”一词是因为我在这里并不是制造一种情况来一般地反对科层制的规划或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是要反对那种帝国主义式的或霸权式的计划思想，在这种思想中，所有的地方知识或实用技术完全被排除在外。

在这本书中我要表明实践知识、非正式过程和不可预见的偶发事件面前的随机行动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我要将城市设计者和革命者的极端现代主义的理念和实践与强调过程、复杂性和开放性的带有批评眼光的理念加以比较。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和列宁是前者的鼓吹者，而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 则成为他们严厉的批评者。第六章和第七章包括了对苏联集体化和坦桑尼亚强制村庄化的描述，这可以说明如果排除了地方实践中蕴涵的宝贵知识的支持，对于生产和社会秩序问题的简单和集权式的解决方案必然要失败（在最早的手稿中还包括了田纳西流域管理局的案例研究，这是美国极端现代主义的一个试验，也是所有地区发展规划的鼻祖。但最后为了不使这本书更厚还是忍痛割舍了，当然现在这本书还是很厚）。

6 最后在第九章，我要概括实践知识的特征，并将它与正式的、演绎的和认识论的知识相比较。在这里我从古典希腊语借用来一个混成词——米提斯（mētis）——来表达我的思想，这个词表示那些只能从实践经验中得来的知识。现在我还要表达我对无政府主义作者（克鲁泡特金、巴枯宁、马拉特斯塔、普鲁东）的感谢，他们强调在创造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与强制的和分等级阶层的协调所不同的相互性的作用。他们对于“相互性”一词的理解与我所使用的米提斯一词的意思尽管还有一些区别，但大部分是相同的。

对社会组织的极度简单化设计与对自然环境的极度简单化设计具有同样的失败风险。树种单一的商业化森林和依靠基因工程与机械化的单一品种农业与集体农庄和人为规划的城市是一样脆弱和失败的。在这个层次上，我要证明社会和自然多样化所具有的弹性，还要证明我们对复杂的和活生生的规则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我想也可能有人会利用这些观点来反对某一类演绎的社会科学，但这些已经超出了我的考虑范围，我将这些进一步的艰辛思考，还有我的祝福，留给别人。

我知道，要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范式，我同样可能会显示出傲慢来，正像刚刚被批评的极端现代主义者那样。一旦制作出可以改变视野的透镜，你往往就会通过这个透镜来看所有的事情。但我还是想对两种指责做出辩护，因为我认为仔细地阅读还不足以支持我。第一种指责是说我的观点是毫无批判地崇拜那些地方的、传统的和习惯的知识。我知道，我所描述的实践知识在很多时候与占支配地位、垄断和排外的实践是密不可分的，这些活动与现代自由主义的感念是相抵触的。我的观点不是说实践知识是自然在神秘和平等状态下的产物。我所强调的是，如果没有正式项目所忽视的那些实践知识的参与，正式的规划是无法立足的。第二种指责是说我的观点是反对政府的无政府主义表现。如同我所清楚地阐述的，国家是一个令人苦恼的机构，一方面它保护我们的自由，另一方面又限制我们的自

由。我的观点是，一个受到乌托邦计划和独裁主义鼓舞的，无视其国民的价值、希望和目标的 国家，事实上会对人类美好生活构成致命的威胁。在一般情况下，国家并非如此残酷，但是我们需要权衡国家干预所带来的利益和付出的代价。

在完成这本书的时候，我发现，从 1989 年以后资本主义大胜利的观点看，书中对一些国家行为方式的批评就像是一个奇怪的考古学。许多有着我所批评的主张和权力的国家或者消失了，或者突然改变了它们的野心。7 然而，如同我在总体上分析科学农业、工业农业和资本主义市场时所清楚表明的，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同国家一样，也是均值化、一致化、坐标化和大刀阔斧的简单化的推动者，不同的只是资本主义者的简单化必须为其带来利益。市场一定要通过价格机制将质的差异简化为量的差异，并推动标准化。在市场上起作用的是钱，而不是人。今天，全球的资本主义可能是推动同质化最强有力的力量，而国家则有时成了地方差异和多样性的保护者。[在《启蒙的觉醒》一书中，约翰·格雷（John Gray）提供了相似的有关自由主义的例子，他认为自由主义是自我限制的，因为它虽依赖文化和制度资本所提供的基础，却必然对其加以削弱。] 广泛罢工带来的法国社会为了适应欧洲统一货币所做结构调整的“大中断”，只是大风中的一根稻草。坦率地说，我反对特定的某一类国家，并不表明我主张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推动的政治上自由的市场协作。我们将会看到，从现代社会工程项目的失败中所得出的结论既适用于市场推动的标准化，也适用于科层制的同质化。8